

铭记历史
缅怀先烈

李竹如：以笔为刃、以墨为枪的新闻战士



李竹如像。

新华社发

在山东东营利津县委党校，红色利津教育体验馆中心内，有一尊雕像，总能吸引参观者驻足凝视——他昂首挺胸，紧紧攥拳，目光如炬，凝视前方。这便是利津县走出的第一位中共党员、新华社山东分社首任社长、新闻战线抗日英烈李竹如。

“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，李竹如把‘一张报纸胜于一发炮弹’这句话挂在嘴边，他主办过多种报纸，以笔为刃，以墨为枪，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新闻抗战的铿锵旋律！”每当参观者来到这里，中心讲解员丁洁都会动

情讲述抗战烈士的故事。

夏日，利津县黄河大堤上，草木葱郁。大堤旁的庄科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文化村，李竹如就出生在这里。

20世纪20年代，李竹如受到革命思想熏陶，白天读书、剪报，夜里组织学生到家里听他读报、宣讲时事和进步思想。1925年春节，李竹如在自家大门贴上了“马列传天下，世界要大同”的对联，这既是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也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信念。

1927年，李竹如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与进步青年一起创办《竞进》周报。

“我要把妨碍社会的丑恶肃清，叫社会美化！”在李竹如的遗物里，有1929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读书时写的十几篇日记，这是当年6月24日日记中的一句话。

他是这么写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他参与领导南京中央大学和南京各校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；奔走办报，如在济南创办《新亚日报》、在上海参与创办《文化报》等，用文字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在山川大地……

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李竹如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他几乎没带什么行装，却带了蜡纸、钢板和刻字铁笔，把《中共中央宣言》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印成传单，沿途散发给群众。在晋东南，他留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做民运工作，创办《中国人报》，后任《新华日报》（华北版）副总编辑。1939年5月，被选调去山东。回到故乡后，他仍然非常重视新闻工作，在

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期间，兼管《大众日报》、兼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等。

当时，《大众日报》创刊不久，报社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，缺乏经验，李竹如便抓编辑、记者队伍的建设。同时，他一直保持在济南、上海办报纸的习惯，并主持社论委员会，每周至少发一篇社论。

1940年1月，寒风裹挟着物资封锁的阴霾，一位报社同志焦灼地找到李竹如说：“印刷厂油墨纸张告急，咋办？”

李竹如把目光投向寻常的有光纸，从未有人用这种纸印报，因此敌人查禁较松。“前人没做过，我们就闯出一条路！”李竹如与工人们并肩攻关，吃睡在机器旁，反复调整机器压力与墨量，终于克服了油墨渗透难题，让有光纸的反面也能清晰印字。

“在抗战进入更加困难的今天，记者担负着更加光荣的任务，他站在宣传战的最前线，不仅是一个宣传家、鼓动家与社会教育家，还应是一个组织者、督促者与指导者。”1940年9月，李竹如在文章《光荣的历史与光荣的任务》中这样写道。

1941年6月28日，新华社山东分社在临沭县（今临沂市辖县）成立，这是新华社国内分社中的第一个省级分社，李竹如兼任分社社长。当天，分社播发了《八路军破袭 敌伪望风披靡》《清河区广大青年涌上抗日哨岗》《泰山区实行统一支差办法》等6篇消息。在战事频繁、通信设施简陋、人员紧张条件下，新华社山东分社起到了宣传群众、鼓舞士气、打击敌人

的桥梁纽带作用。

无论在何时何地，李竹如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，以坚定的立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战线，坚定人民的抗战决心。1942年秋冬之际，侵华日军在沂蒙山区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，李竹如和战友隐蔽在山沟里，一边守卫通信线路，一边印制内部通讯。11月2日，在对岗崮突围战斗中，李竹如不幸中弹，英勇牺牲，年仅37岁。

历史川流不息，精神代代相传。

“爷爷对我父亲影响很深。”年过六旬的李竹如孙女李晓波告诉记者。她说，父亲李维民也追随爷爷脚步，于1946年参加革命，先后在《前锋报》《进军报》《人民前线报》《解放军报》等担任记者，在新闻战线冲锋陷阵。

“我还珍藏着爷爷的文集，当年办的报纸和参加革命活动的老照片，但最宝贵的财富是伟大抗战精神。这些都是我家的传家宝。”李晓波感慨道。

如今，在利津县李竹如烈士纪念馆广场、烈士陵园、红色利津教育体验馆等纪念馆教育场所，李竹如烈士雕像静静矗立，见证着祖国大地的日新月异。

今年40岁的讲解员丁洁，也是利津县委党校高级讲师，已任教15年。她说，自红色利津教育体验馆中心2023年开馆以来，党校学员来此参观是必选课程，通过沉浸式体验，感悟伟大抗战精神。“传承是让火种永不熄灭的关键。李竹如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的新闻战歌。我们要用心用情讲好抗战故事，赓续红色基因！”

（据新华社）

新增一位烈士 百团大战英烈墙完成新一轮补刻

百团大战英烈墙补刻仪式日前在山西阳泉举行，八路军烈士尚兆阳的姓名补刻上墙。至此，英烈墙上记载的革命烈士总数增至4856人，这也是该英烈墙自建成以来补刻的第五位烈士姓名。

根据史料记载，尚兆阳是山西省平定县冶西镇潘家峪村（自然村，行政村是新派联村）人，1938年7月投身革命，加入平西抗日游击队，并于次年编入八路军129师385旅，担任电话员。在百团大战期间，尚兆阳随部队在寿阳县董家峪村（自然村，行政村是冀家村）执行任务时，不幸被捕，壮烈牺牲，年仅19岁。

“尚兆阳烈士没有直系后代，是他的侄孙促成了烈士‘归队’。”阳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科长张莉说。尚兆阳的侄孙尚建军在参观英烈墙时，发现其四爷爷尚兆阳的名字未在名录之中，随即向平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补刻申请。经市、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严格核查比对，确认尚兆阳为百团大战期间牺牲的革命烈士，最终按程序将其姓名补刻上墙。

据了解，英烈墙坐落于山西省阳泉市狮脑山顶峰，总长超百米，于2010年镌刻落成，是百团大战纪念馆（碑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1940年8月，为粉碎侵华日军的“囚笼政策”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。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，取得辉煌战绩，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。

（据新华社）

“书香门第”里的 “书香”是什么香？



“书香门第”是我们形容世代读书人家的专属词汇，很多人认为“书香”就是书籍本身的味道。比如古代线装书所散发出的纸张、墨水、糨糊以及丝线混合在一起的气味，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翻开《辞海》《本草纲目》和历代藏书家的笔记，我们能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：“书香”的本义，是芸香草的香气。

在印刷术不发达的古代，书籍是极其珍贵的财富。一卷竹简、一册帛书、一本手抄本，都凝聚着读书人的心血。而书虫，是书籍最大的天敌——它们会在纸页间蛀出密密麻麻的孔洞，让珍贵的典籍毁于一旦。

为了保护书籍，古人发明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：在书籍中夹入芸香草，或者在书橱里摆放芸香草。这样一来，芸香草的香气会慢慢渗透到纸页中，不仅能驱赶书虫，还能让书籍常年保持一种清新的香味。久而久之，这种来自芸香草的香气，就被人们称为“书香”。

这种保护方法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，宋代李石在《续博物志》中引用曹魏郎中鱼豢所著《典略》的记载：“芸香辟纸鱼蠹，故藏书台称芸台。”意思是芸香可防治书虱，因此藏书台叫做“芸台”。

古代的一些书室中常常备有芸草，于是书斋就有了“芸窗”“芸署”“芸省”等说法。在红楼第八回中，曾提到贾宝玉写了一幅字，命晴雯贴在了书房的门斗上，黛玉见了还夸他字写得真好，这三个字写的正是“绛芸轩”。在他写的一首《秋夜即事》的诗里，也有“绛芸轩里绝喧哗，桂魄流光浸茜纱”的诗句。

不仅如此，人们还将这个“芸”字与书籍牢牢关联在一起，比如书籍就叫做“芸编”，读书仕进者为“芸人”，就连校书郎都被叫做“芸香吏”，白居易就曾当过这个官职，他在《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》里这样写道：“前年题名处，今日看花来。一作芸香吏，三见牡丹开。”

宋代邵博的《闻见录》中也提到：“芸草，古人用以藏书，曰芸香是也。置书帙中即无蠹”。因此，芸草为古代书籍常备的杀虫神器，同时还可以当做书签使用，一举两得。天一阁又称书楼，是明代中期兵部右侍郎范钦辞官回乡后修建的，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，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天一阁有不少珍贵的藏书保存至今，除了严格的藏书管理制度，据传另有藏书诀窍。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登观后留诗云：“久闻天一阁藏书，英石芸草辟蠹鱼。”说的就是“英石收湿，芸草辟蠹”这个诀窍。以英石和芸草防潮驱虫的天一阁，是古人巧妙利用自然条件保护藏书的典范，历经数百载仍保存完好，这背后，芸草功不可没。

然而，香料学者对于古籍中描述的芸香究竟是何种香料仍存在争议。一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，芸香是指芸香科芸香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这种植物又被称为七里香、香茅等，其根系发达，植株高达1米，全身散发着浓郁的特殊香气。然而，实验结果显示其驱虫防蛀的效果并不显著。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，禾本科香茅属的草本植物芸香草，也可能是古籍中所记载的芸香。这种芸香草原产于地中海沿岸，后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引入我国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报春花科珍珠菜属的灵香草是古籍中所述的芸香。
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王少奇：搞革命就不能怕死

在天津市蓟州区盘山的岩石上，很多抗日标语清晰可见。这是王少奇当年带领当地军民在这片地区坚持抗日斗争的痕迹。

王少奇，原名王毓琨，字季如。1912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。1926年，他考入河北省立通县师范学校，在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，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。1935年，王少奇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6年，王少奇受党组织派遣到蓟县（今天津市蓟州区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王少奇拿出全部积蓄开办了一家诊所，每日身背药箱，一边给群众看病，一边进行抗日救亡宣传。仅

半年多时间，他就发展了大批抗日救国会会员，并在板桥镇周围的20多个村庄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。

中共蓟县县委成立后，王少奇担任了县委常委、蓟县抗日救国总会宣传部长等职务。

1940年，包森、李子光和王少奇等人以盘山为依托开辟建立了盘山抗日根据地。随后，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共实行了五次惨绝人寰的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实行野蛮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“三光”政策。日军宣称，“要搞垮冀东，首先要搞垮蓟县，要搞垮蓟县，就必须搞垮盘山”。

盘山是敌人“扫荡”的重点地区。时任蓟（县）宝（坻）三（河）联合县县

长的王少奇组织建立了盘山联合村民兵班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；在日军扫荡时，他就组织群众一起藏山洞、睡山沟。他常教育民兵：“搞革命就不能怕死、怕吃苦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要坚持到底。任何时候都不能泄露党的秘密。”

1943年年底，王少奇调任冀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兼政委。为了解决部队医疗问题，他组织召开卫生训练班，还秘密潜入北平、香河等地筹措资金、药品和医疗器械。“王少奇和战友们的不懈努力，为冀热辽军区奠定了卫生工作基础。”天津市盘山烈士陵园主任郑辉说。

1944年10月17日，王少奇在丰满

县杨家铺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时，遭数路日伪军包围。王少奇尽力冲出敌人火力网后，看到战友负伤，于是果断返回，为战友包扎时不幸胸部中弹。为了保守党的机密，他艰难撑起身体，烧毁了身上携带的文件后继续向敌人射击，并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。

每年清明，王少奇之孙王继烈都会带着孩子到盘山烈士陵园祭奠，在王少奇的墓碑前，讲讲这一年取得的新成绩。“自爷爷起，我们家四代人都是共产党员，这份红色基因一直激励着我，我也会继续担负起属于我们的责任，传承好这份红色家风。”王继烈说。（据新华社）

这座200多年的“水立交” 藏着古人的治水智慧



巨丰堰、永丰堰与平江河支流在三拱桥渡槽处呈立交分布。

春日暖阳下，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溪场街道寨村，村民们抢抓农时，翻耕土地、撒播谷种，田间地头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。滋养这片农田的水源，来自不远处历史悠久的古堰——巨丰堰。

巨丰堰坐落于秀山县平江河畔，始建于1767年，已延续使用259年。这座百年古堰集防洪、灌溉、排沙等功能于一身，布局合理、结构科学，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灌溉和防洪效益。

秀山地处渝东南盆缘山地，为典型的丘陵山区地貌。作为“立体化”灌溉工程体系的典型代表，巨丰堰集中展现了丘陵山区群众的治水智慧。

其中，最具特色的是在三拱桥渡槽处，古人利用地形高差形成的独特“三层立交”奇观。作为这座百年古堰的核心枢纽，三拱桥是目前中国现存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且仍在使用的古代砌石结构渡槽。巨丰堰、永丰堰与平江河支流正是在此呈“立交”分布。

“专家分析认为，巨丰堰灌区位于平江河沿线平坝地区，但灌溉沿程农田高程差异较大，加之几条自然河流、沟谷的穿插阻隔，灌溉渠系‘立体化’特征明显。”秀山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巨丰堰与永丰堰在三拱桥立交交汇，利用不同水源点灌溉不同高度的田地，克服了海拔高差，实现“高水高灌、低水低灌”，确保了灌溉效益的最大化。

巨丰堰经过历代不断修葺，“立体化”灌溉工程体系也不断完善。目前，秀山巨丰堰、永丰堰渠系总长达40多公里，灌溉面积达1.6万亩，为平江河沿岸的广袤沃土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。近年来，重庆曾遭遇极端高温干旱天气，巨丰堰展现出其灌溉系统的强大韧性，为实现灌区内粮食稳产增产作出重要贡献。（据新华社）

从先秦到唐代： 中国“春秋假”的历史渊源与当代传承

近期，江苏、四川、安徽、广东等地相继出台相关政策，稳步推进中小学春秋假，其核心目的在于让学生劳逸结合、科学调节学习节奏，助力家庭错峰出游，推动文旅与教育融合发展。

其实，“春秋假”并非现代教育全新尝试，在中国古代早有雏形，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。彼时官方办学以“庠序”“国学”为核心，虽无固定假期制度，却遵循“春诵夏弦，秋学礼，冬读书”的季节性学习规律，顺应天时而开展教育。春耕、秋收等农忙关键阶段，学子需返乡助力农事，由此形成最早的“农忙假”。这类假期时长无统一规定，以完成家中农事为准则，是古代最贴合农耕文明的假期形态，彰显了古代教育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的初心。

历经数代发展，至国力强盛、文化繁荣的唐代，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并完善，中央官学体系日渐成熟，国子监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弘文馆、崇文馆等各级官学建制完备，配套假期制度趋于规范，形成田假、授衣假、旬假三大核心假期，这套体系兼具人性化与实用性，被后世多朝借鉴沿用，影响深远。

田假便是唐代学生的“春假”，是古代农忙假的制度化延续。唐代官学学子均享有田假，五月正值麦熟丰收，田假主要让学生返乡协助收割小麦、打理农田，规定时长十五日，若家乡气候、农时不同，可按实际耕种情况灵活调整；家距学校路途遥远的学子，还能申请额外往返路程假，不计入正式假期。但朝廷假期管理严格，学子无故逾期不归，将面临除名学籍的处罚，国子监生大多严守规矩，极少违规，可见唐代官学管理既有人文关怀，又不失严明规范。

授衣假则对应唐代“秋假”，由国子监统一规定在每年九月，国子学、太学等官办学校的学子与教职人员均可享受。假期时长同样十五日，往返路程时间另行核算，不计入假期。其设立初衷是让学生返乡领取御寒冬衣，为寒冬做准备，假期名称源自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”的传统农事习俗，既契合霜降前后天气转寒、筹备衣物的时节规律，也饱含朝廷对学生生活的真切关怀，尽显民生温度。

除春秋两季长假，唐代官学还有常态化短假——旬假，《唐会要》记载“每旬，并给休假日”，即每十天休息一天，又称“休沐假”。旬假最初为朝廷官员设立，供其休息沐浴、整理仪容，以更好投入政务，唐代官学师生也享有该福利，得以短暂放松调整。唐诗中留存着唐代春秋假的鲜活记录。皎然“春田休学稼，秋赋出儒官”，描绘出学子春日返乡务农、秋日归学备考的耕读日常。李峤因病无法归乡过田假，作诗抒发乡愁；孟浩然在九月授衣假时无寒衣可备，感慨“无褐竟谁怜”，既折射底层文人境遇，也印证了假期在当时的普遍性与重要性。

与当下春秋假侧重调节学习、促进文旅不同，古代假期扎根农耕文明，更强调知行合一、体察民生的实践教育。古人反对“四体不动，五谷不分”，假期并非单纯玩乐，而是让学子走出书斋，参与农事、体会稼穡艰难、感知民间疾苦，在实践中增长见识、涵养品德。

从先秦农忙假，到唐代制度化的春秋假，中国古代假期制度始终扎根传统文化与民生实际，将教育、农事、人文关怀融为一体。如今推行的中小学春秋假，既是对传统假期文化的传承创新，也是新时代教育理念与民生需求的契合，既让学生劳逸结合、全面发展，也让千年唐韵里的人文智慧，在当代焕发全新生机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